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17) 01 - 0065 - 10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课程进入党校

■ 胡大牛

[摘要]延安时期,中共党史作为课程进入党校,是毛泽东全力倡导的结果。中共开办党校之初,从课程设置到讲授,都没有党史的内容,这就使干部理论储备存在缺陷,影响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巩固。于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报告,以马列理论教育为重心,对干部教育作了系统论证,此后,党史课程首次进入党校。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了将马列理论与党史及当时的实际相结合,找到发展中国革命道路,理解中国革命战略目标的要求。以此为基础,中央学习组和各地各系统的高级学习组开展起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等多种场合,指出了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具体方法和组织要求,并对干部的党史学习进行严格督导。如此,六届六中全会的学理论学党史以提高理论水平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保证了整风运动和抢占东北等后来各项工作的完成。

[关键词]毛泽东;中共党史;延安;党校

[中图分类号]A84; D231

[文献标识码]A

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开始作为课程进入党校,毛泽东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本文拟就中共党史在延安时期进入党校的过程,尤其是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作粗略探讨。

一、党校开办之初没有党史课

若从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算起,到抗战之前,中共开办党校已有13年历史了。关于党校的教学内容,大革命时期,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要求编印的“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常识,即对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作通俗解释,二是党务常识,即“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2]。土地革命时期,在白区、苏区先后开办的速成科、训练班、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里,先是规定“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基本问题与列宁平生及

其学说等”^[3]，“参加政治的与各种工作问题的讨论,并使之实习各种指导工作”以“力求时间短而切实有效”^[4],后来明确教学内容为军事训练、实际工作常识、政治经济常识各占三分之一^[5],再后来又增加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课^[6]。概括起来大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课程名称下讲革命常识,以执行政策策略为总要求进行军训和讲授工作常识、政权建设等业务内容;以党建课程名称讲组织、宣传的方法原理即技术层面的党务常识。这之中没有党史课程存在。这或许是由于当时党和党员、干部都很年轻,自认为无史可言之故。

值得注意的是,党校教育几乎从一开始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乃至“中国化”。1926年7月,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88页。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

[5]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6] 参见《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中央扩大会议感叹党员质量退化，“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1]。1928年6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培训中共较高级干部的列宁学校的课程须通过半年以上“专门工作的实习”，“使他们在原则以外，能学到许多实际办法”；并“提议东方大学仍须设立中国部”，以解决课程等“无法注重于中国化问题”。^[2]国内也如此。1929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反对离开策略和工作去高谈理论的“最恶劣”的清谈倾向。^[3]因此，党的教育工作日益强调“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4]，具体办法是各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问题、扩大个别教育。这些当然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干部马列理论水平的重视，但他们更注重增强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当时党校课程，从其设置到讲授，都很“实用”。

这样做并不能取得完全理想的效果。1925年1月，中共四大指出，过去对一般同志的革命策略认识、政策讨论等“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以致一些同志“常常表现其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的色彩”，甚至出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5]1926年7月，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党员质量退化表现在“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有雇佣劳动倾向”等。^[6]土地革命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因为革命、党务的常识教育，加之朴素感情，都能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乃至流血牺牲。但由于包括党校在内的教育过于注重“实用”等原因，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足，难以从思想理论高度去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环境中的路线、方针、

政策问题。

二、苏区党代会以后党内的 思想政治组织状况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会）的结论中，提出党在新时期为担当起以全民族统一战线去实现民主、推动抗战的政治领导责任，应该把造就大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消除了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懒惰消极，具有“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性格和作风的新老干部，作为工作任务的主要一环。^[7]这里提出的培养干部发展党、发展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新要求，加上同年8月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形成了中共抗战大战略的基本内容。

但是对此大战略和与它相关的马列理论、中共党史有正确认识，进而能领悟、把握并自觉有效地贯彻执行的人，当时在中共内部不多。在军事上，有同志在开始时不太理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创造性方针，提出把需要大规模兵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密切结合或开展“运动游击战”。^[8]这种作战方式是红军过去的长项，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则暴露了自己的短处。毛泽东随后不得不用了近三个月时间反复督导，加之前线将领在平型关战斗后很快清醒过来，认识到山地游击战对于持久抗战歼敌的至关重要，才将游击战方针予以落实。

在思想理论上，针对国民党的加紧反共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反复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警醒全党坚定党性立场。但当国民党已在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延安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72页。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46页。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页。

[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4页。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5页。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72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8] 参见《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9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几个学校却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搞国共理论辩论赛，结果是持中共立场的一方，输给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国民党统治区报刊的马列学院人员所扮演的国民党一方。可见，中共急需提高全党特别是干部理论水平。这次辩论的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决定去“驳一驳”“胜利”方，到马列学院以马列理论结合党史，阐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问题^[1]，开始提出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

在政治上，苏区党代会代表中就已经有“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2]的观点出现。这同让国民党来领导抗战的认识和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当时已经导致中共内部不少人难以分辨政治是非对错，将统一战线仅局限于为抗战而服从国民党的小统战，不符合毛泽东关于发动全民的大统战的战略设想。虽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这种右倾错误作了一些纠正，但不少高级干部对它并无真正认识，尤其是不能在思想认识上，将它同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错误联系起来，看到这两者的两极相通。这都源于不了解中国实际而满足于对马列理论及当时时局一知半解的主观主义。所以在1940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到陕北后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总结革命及抗战特点的规律性认识，提出要以“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总结党史上的政策错误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3]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列理论的面目出现时，对于中共从思想到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清晰可见的。它若再发展，将会导致在政治上认同国民党而背弃中共的恶劣后果。

在组织上，取消讲原则的积极思想斗争、

心目中只有集体只有熟人的小圈子、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对工作敷衍了事等自由主义的“腐朽庸俗的作风”^[4]发展起来。如进过抗大和党训班、学过党建课程并入了党的刘力功，毫无组织观念，拒不服从分配去基层，以退党相要挟要进高级机关或学校，像这种要“组织服从个人”的讨价还价，当时“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5]又如新老干部互相瞧不起、闹不团结，散步也要以河划界各自为阵^[6]；各类干部之间以各种不同关系结成好多“戏班子”，对内亲热、对外攻击^[7]；党群干群关系差到连遇上躲空袭警报这种要命事也不愿走一条道^[8]。直到整风运动开始后，延安的自由主义思想仍然非常浓厚，却“没有人指破这一点”^[9]。这些现象放在平时，肯定坏事，放在战时，更是要命。于是，为纠正这些现象而努力，成为毛泽东自青年“文化人”大量涌入延安时起就开始了的工作常态。他在学习运动之前之中反复强调“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0]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1]。

可见，此时的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离苏区党代会提出并追求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有相当差距。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1页。

[5]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8页。

[7]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8]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2页。

[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8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7、61、79页。

[11] 《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1] 参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三、提出党史教育之初的干部学习

产生上述现象的理论根源，在于党员、干部的教育没有跟上，马列理论修养不够。若深究为什么没跟上，则不能忽视之前党校教育表现出来的马列理论与中国现实似乎不搭界的认识。这一认识也导致思想理论教育无法深入人心，难以帮助党员干部在中国复杂环境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政治立场。再加之扩大有文化的革命队伍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决定采取不换人、换思想的办法，开展一场联系中共及中国实际的马列理论学习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来统一新老干部及文化人“极庞杂的思想”^[1]，实现“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2]，应对当时困难和走向光明未来。

于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以马列理论教育为重心，对干部教育作了系统论证。他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这就提出了研究马恩列斯理论、民族历史、当前运动特点等三点学习任务和内容，并实际上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他为此阐释说：学理论“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应该割断历史”，应该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以中共历史为重点的近代史进行学习和总结。由此将历史与马列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帮助人们避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掌握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以马列理论和中国历史为基础，形成一种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列理论。这种新理论其实来自于马列理论指导的中国实践，是一种对于历史发展的特点、规律的经验总结，因此可以“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指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7页。

导当前运动”起“重要的帮助”作用。^[3]这就是说，历史、党史的学习和把握，是学习和运用理论的基础和中介；可以通过结合历史、党史来学理论，实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形式转换和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就需要破除对马列理论的教条式理解即主观主义的学习和思想方法，破除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并向中共连思想都得交给蒋介石^[4]的反共思潮开战，首先解决中共已经面临的思想上、组织上“投降”的危险^[5]，进而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为胜利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理论“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需要开展“学习竞赛”来促进。^[6]在六中全会前后，加强干部教育已成为中共领导层比较一致的共识。在苏区党代会上，有干部提出通过学习马列的工作作风并“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7]，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还有干部提出，组织形式是“建立党内的教育网”，内容是理论教育“和革命的实际工作渗透一起”，以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达到个别而具体地教育干部的目的。^[8]其中，干部教育网络化即多层次全员参与，较有新意；转变作风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后来的整风学习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了落实《论新阶段》的要求，中央规定党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马列主义的原则”；“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多采讨论方式”。教育计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0—651页。

[4] 参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145页。

[5]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94页。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0、651页。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8]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218页。

划是省委县委之下开办的普通党校，开统一战线、军事常识或训练、党的工作等课；中央至省委办中级党校，开统战、军事、社会科学常识、党建等课；中央办高级党校，开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建课；另设从中央到县委的马列研究院、抗大及党务、县政、游击、财政、公安等训练班。^[1]这就大致形成了以党校、军校为主体，辅之以各级各类干部业务学校、训练班的干部教育体系；形成了党校主干课程体系的雏形，即马列基本理论加党史、党建。不过这时党史课程仅限于高级党校，且只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建两门课的一部分。

六届六中全会刚开完，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作出决议，评价此书“叙述了和归纳了共产党的伟大经验”。决议还指出，马列主义是以综合“斗争的实际经验为基础而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所以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阐明理论的规律性认识以“武装党员”“教育党的干部”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要消除把马列主义当作“脱离党史而独立的学说来讲授”的“有害现象”，提倡“独立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和理论的方法”，使干部具有在“实际工作中来运用这些规律的本领”。^[2]这些认识与《论新阶段》对党史功能和学习研究方法的论述是一致的，成为党史最终进入党校的理论依据。1939年2月15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规定各师开办教员训练班，设九门课，其中一门是中共党史。^[3]第一次将党史作为独立课程提了出来。

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5月17日发出宣传教育工作指示，规定县委以上开办的干部训练班，

应以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党建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中心内容。^[4]5月20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规定的学习内容更是只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及毛泽东临时加上的时事与政策^[5]，没有中共党史。这些从细微处反映了当时中共内部就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还不够一致和明确。

毛泽东只好自己动手写文章说明这一问题。10月4日，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根据对18年党史分阶段研究所得的经验，系统阐释了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他认为：固然要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但其指导思想和评判标准是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有无经验，对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是否懂得，说到底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是否有完整、深入、统一的理解。现实是新党员未受教育、老干部没有足够经验，对历史、现状、特点、规律还不懂或懂得不多，对实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完全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这就要求为了保持统一战线、继续抗日团结进步，必须使党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所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使党巩固“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6]这是在论说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相结合，将党的全面发展巩固，与实现党的全部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同步进行的“大党建”，而非过去那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孤立的“小党建”。其基本做法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去指导和总结党史及当时各次运动的经验，形成对于中国和中共历史与现实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理论指导，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互相促进，保证中共领导革命及抗战走向胜利。正是

[1]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701—702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4—145、147、151页。

[3]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

[4]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06页。

[5]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612、613、614页。

在这个意义上,党建才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起,成为三大法宝。党校的全部课程都是为着“大党建”目的而设计与展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整风期间说:“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程,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1]这即是说,党校的主体课程应当是马列主义理论、党史、党建这三门。马列主义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理论基础;党史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过程的体现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反映;党建则遵循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从组织的结构、运作到作风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为建设好组织、教育好党员,做好党的工作提供重要的组织基础。这三者各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性,既有分工,又共同作用,涵盖了党的思想方法、政治理论、组织基础等“大党建”的全部,应该成为党校的主课。

由此,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2]。学习的主要课程为五类:第一,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第二,中课程级,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第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第四,时事政治课,分为中国、日本、国际;第五,军队中的军事学习课。初中高三级党校的课程,也以此为标准。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再次规定各级党校课程参考前述指示。^[3]这表明毛泽东倡导的通过党史、历史学习来加强理论修养的观点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但是,在这一体系设计中,中共党史还是没有成为独立的一个课程,只是在其他相关课程中涉及,而且授课对象仅限于执行层面的初

级干部。按照《论新阶段》的要求,最需要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应该是中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但按照这一课程体系的设计,高级干部却没有这方面学习内容。对于这样的学习,人们感觉良好。6月6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报告反映:4000余名干部分三类参加了学习,甲类即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乙类即新干部以党建为必修课,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丙类干部则学习文化和党建,皆大体学完,且部分人已觉得“读书乐”;问题只在于对研究时事政治的重要性没有做好,解决办法是结合战争问题,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进行相关讲演和研究,“找出战略上、策略上的结论”,同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4]这固然是积极的影响,但也可看出,人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要求干部教育内容必须有时事政治教育,即《论新阶段》所提“实际运动的了解”的目的所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研究马恩列斯理论与“历史知识”是互相联系并最终是要归并到历史发展中去的;更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根本考虑在于要求干部将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认识问题,为学习理论提供基础,使干部形成大局、全局的战略意识^[5],从而理解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好理论。概括地说,是不理解毛泽东号召学历史、党史以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

总体来看,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党员干部的各类培训学习中,虽然已经加入了中共党史方面的内容,但中共党史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党史课的地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党史学习助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

四、党史在整风运动中进入党校

新的变化始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他批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

[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0页。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139页。

[4] 《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3、41—42页。

[5]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0页。

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是“极坏的作风”，“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必须打倒；指出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强调研究马列应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并指出学习联共党史可看到列宁、斯大林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实践相结合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从而“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1]这实际上提出了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共党史即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理解中国革命战略及目标，找到中国革命道路。以此为基础，7月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为了有效组织力量，必须加重历史等方面情况的调研，把了解敌我友情况的教育当作各级干部与干校的正式课程，以反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恶劣作风和现象。^[2]9至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检讨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9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掌握思想教育”；“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时“一方面研究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3]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4]。

按照上述要求，9月26日，书记处决定组织中央学习组和各地各系统的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半年内“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

题目”，然后研究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5]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是否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理论，应以学生“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即“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6]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时，将这个标准进一步解释为读马列著作应该“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即通过科学分析中国实际，“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并要求党校的同志应当“有的放矢”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7]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整风报告，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22个整风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因此全党要抓紧学好文件，“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做好方法论上的思想准备。“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8]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整风中始终坚持的。如1944年5月20日，他到中央党校第一部作报告阐释研究方法时，要求对党史经验采取既要完全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分析问题等态度^[9]；次年2月15日，他在党校五部、六部的报告会上从党史和社会历史角度分析山头主义问题时，仍然强调为了胜利而在思想上“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以逐步溶化和消灭山头，使“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10]可见，通过学党史来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800、802—803页。

[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1、362—363页。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375页。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1页。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页。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63—76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5、819页。

[8]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6—417、411、413、414、415页。

[9]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7—93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7、256、253页。

学理论,目的在于从思想方法上理论联系实际,并在思想上增强党性,统一认识,进而团结队伍,准备胜利。这个要求指导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要实现目标,必须有组织保证。1941年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的通知发出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于10月6日率先成立高级组。^[1]18日,书记处再发通知,以南方局为榜样,请各地立即考虑成立高级学习组并报中央。^[2]11月25日,书记处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分高级组为政治组与理论组,政治组对干部的级别与党龄有限制,理论组由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更高的干部组成。^[3]这为避免干扰、集中讨论问题提供了组织保证。1942年4月3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中央党校的整风与检查工作。^[4]5月1日,中央党校作出研究整风文件的补充规定^[5],引进党史并按新部署进行教学。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党校开办第二期,抽调华北华中大批党政军政干部来学习;由毛泽东兼任校长。^[6]这些为以党校为中心的学党史促整风,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关于学习内容,中央学习组于1941年9月29日规定,高级组要看六大以来的文件。^[7]这也就明确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是党史。为此,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六大以来》于12月出版。虽然中央学习组在11月4日发出了高级组“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的学习内容调整通知,但仍规定年内须通读《六

大以来》83个文件与列宁《左派幼稚病》等书。^[8]特别是书记处于11月25日制定的高级组组织条例,规定政治组研究政治实践,“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理论组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9]这些都以变通方式坚持了通过学党史去理解理论,在实践基础上解决思想方法论等问题的初衷。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决定,规定高中级干部分别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思想方法论、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我党20年奋斗史、近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中外革命史为实际材料,依次从政治、思想、经济、历史科学四方面逐步学习理论。^[10]为学好这些内容,毛泽东于3月30日专门在中央学习组讲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指出“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系统考虑昨天走过的路和经验,才能明确今天和明天该怎样走,所以,“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即“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收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功效。^[11]这就确定了从学历史、党史入手学理论的内容和方法。

对于学习的具体要求,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规定,编组“以地域相近,而又工作系统相同者为适宜”^[12],旨在便于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相互探讨,从而确立了以研讨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1942年,在职干部教育进一步规定,高中级干部均须采取学习组形式,以自学为主加集体讨论与指导的方式,开展党史和理论学习。^[13]在方法上,根据毛泽东关于

[1] 参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3]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08—709页。

[4]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3页。

[5] 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7页。

[6]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7]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8]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676页。

[9]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08—709页。

[10]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49—150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09页。

[13]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150页。

研究党史的讲话,以“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为“根本的方法”,以“古今中外法”作为具体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研究”,重在“研究路线和政策”。也就是说,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而非主观主义的态度,以所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为本,从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乃至各方联系的系统的大环境入手,在马列理论指导下,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求得对中国特点的认识,达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的目的。毛泽东以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三个时期的党史研究为范例,从革命的任务、群众、打击目标三点来分析问题,最终得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策略只能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的结论。^[1]随着中央政治局2月28日作出的军事学院高级班、延安高干在整风中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2],自学和研究原著文件为主,学习组研讨为辅,既弄通理论和实际,又培养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分析判断的能力的学习方法,传到了党校。毛泽东作为倡导者,对运用这套方式方法进行了严格督导。如1945年在中央党校讲到山头主义问题时,他就强调要用分析方法,开会检讨历史,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出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责任,以运用好“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他还指出,党校应“提倡这一条”。^[3]

由于党校在干部教育中的极端重要性,上述内容开展之初,毛泽东就在1942年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

总课题为党的路线。^[4]会议对党校作出新决定:“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5]经过一年多的实践,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党校两年学习,采用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学六门课,即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及军事班的军事课、文化班的文化课,使大家把理论问题搞通、提高一步。^[6]可见,党校通行课程实际上是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两门,党史因此成为党校最基本课程,旨在通过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来增强党性和实际工作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7]

上述步骤和要求,都基于一个逐步深化的基本认识——党史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共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中介和产物,是中共思想理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因此,高中级干部应站在党和人民立场,弄懂弄通马列主义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提高理论修养和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和信心,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培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毛泽东全力推动党史作为理论课程进入党校课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与讲授党建知识和研讨解决党建现实问题的党建教育,与辅助提高干部文化素养的知识教育等课程一起,构成党校课程体系。可见,党史进入党校的过程,是理论认识深化和自觉的发展过程。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以增强党性修养与培养系统性、预见性思维能力和全局指导能力的理论教育为重心的党校教育。这种党校教育与以各种业务培训为内容的其他干校教育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如此,六届六中全会以学党史来提高理论水平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保证了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399、406、408、402页。

[2]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5页。

[4]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6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8页。

[6]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2页。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1页。

五、党史进入党校课堂的效果

从历史发展情况看,通过学党史来深入学理论,顺利推进了全党工作。在思想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说,是此前几年整风学习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行动指南。冀晋区文联在七大后半年创办的政治文化综合性刊物《新群众》,从开办起就以“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思想”,“是思想上的‘手和脚’”为基本认识,后来又强调干部应“了解周围的事变”、能“懂得阶级力量的变化”、有“尖锐明确的科学的预见性”、善于“吸收新的经验和方式方法”,才能跳出“事务主义”的泥坑。^[1]这些正是毛泽东在干部学习研究党史和理论的过程中倡导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方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新群众》作者群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高中级干部和文化人,开始理解了毛泽东对于通过党史学理论的实质要求,并已经能在实践中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了。这所表现出来的深化了的理论认识和理论自觉,使大革命以来的“左”右倾政治思想、散漫“唯我”的自由主义观念和行等在一定范围内失去了市场。可见,基于历史事实,才有理论及对理论认识的正确;弄清正确理论,才有政治立场方向的清楚和坚定;坚定政治信仰,才有队伍的团结整齐、行动的统一。因此,以学党史为基础的学理论,使中共在思想上开始巩固和发展起来。这最直接地表现在毛泽东对七大所作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评价上。

由于在思想上学习和研究党史、马列理论,形成了“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的意识和原则^[2];同时,在实践中把理论与党史相结合来解决问题,如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总结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解决其历史争论问题,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

和向党闹独立性、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偏向;1943年西北局高干会强调以贯彻对敌斗争、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十大政策来巩固党,以马列主义方法论“反对自发论”、纠正“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遵循“以斗争求团结”原则而“同人民打成一片”等^[3],党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也顺利多了。新老干部军地干部更加团结、党群干群军民军政关系也有了新的面貌。所以毛泽东从“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的现象,看到共产党人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不禁感慨“从此天下太平矣”。^[4]这种思想统一、政治团结、行动一致,保证了中共中央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有效贯彻执行,为后来的成绩和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党校1000多名团、地级以上学员参与抢占东北战略部署的行动,最直观地说明了学习党史、弄通理论、明确方向和政策策略,对于自觉、坚定贯彻中央决策,推进事业胜利发展的作用。因为有此两年前党校的党史和理论教育的坚实基础,这些学员对目标、任务、责任极其明确,无须教育动员,就被中共中央作为好钢用在了刀刃上,1945年8月17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狂欢中时,他们已经悄然踏上了征途。他们本着从党校增强的党性、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以坚定迅疾有效的行动,与后续的2万干部和11万军队一道,在完成东北根据地创建、掀起土改暴风骤雨、决胜辽沈、百万大军重入山海关的辉煌业绩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在加快中国革命进程的同时,他们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共中央的革命大战略的正确性,印证了毛泽东要求通过党史学理论以增强党性、搞好党建的决策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共党史作为课程进入党校的过程,是毛泽东全力倡导并在整风运动中着重加强的结果;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与中共党史相结合,使理论联系实际从肤浅的工作技术层面向理论和思想方法层面深化的过程。因此,党史作为

[1] 参见陈友良:《〈新群众〉与毛泽东的〈文化课本〉序言》,《党的文献》2016年第2期。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29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2、74页。

[4]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页。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17) 01 - 0075 - 06

延安时期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思想的文本解读

■ 余守萍

[摘要]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实现党的思想领导为目标，以展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以干部教育、学习运动、文化建设为主要途径和方法，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实现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 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建设；从思想上建党

[中图分类号] A84；D231

[文献标识码] A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充分吸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

思想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共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也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考，对于我们“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1]，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掌握思想领导 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延安时期，如何能在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采取正确的革命策略，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 页。

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形成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的基础、中介和产物，除了存史的史学意义外，本身就是中共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正是从学习和研究党史切入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使全党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开始弄懂弄通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共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由此形成的党的战略策略的正确性，从而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增强了党性，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以学党史为重心的调查研究，党的干部走通了群众路线，具备了认识事物发展的系统性、长期性、预见性的战略思维能力，

同时解决了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问题，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起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所以，党史作为理论课程在党校的存在，与组织技术层面的“小党建”不同，是为了维护思想根本、发展政治能力、强化组织建设，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全面发展的“大党建”的应有之意。

〔作者胡大牛，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重庆 400041〕

（责任编辑：茅文婷）